改革开放，使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开放的中国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前来学习、工作、生活。他们亲眼目睹中国30年奇迹般的发展，亲身感受中国30年日新月异的变迁。一些外国友人将其感受付诸笔端，汇集于本刊《感受巨变》栏目，与读者共同分享时代变革带来的喜悦和对未来发展的思考。

——编　者

从教育交流看中国进步

赵诚惠（韩国）

作者简介：赵诚惠，韩国籍。1996年9月到合肥联合大学中文系任韩国语教授。2005年安徽省政府为其颁发“黄山友谊奖”，2006年荣获中国政府授予外国专家的最高荣誉——“国家友谊奖”。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作为一个在中国生活了十多年的韩国人，我也是中国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亲历者。

1996年，我和丈夫从韩国来到安徽的合肥学院（时称合肥联合大学）任教。那时，学校规模不大，生源主要来自本省，国际交流仅集中于和德国的几所大学。此后10余年，伴随着学校的成长与发展，学校的整体实力明显提升，生源逐步扩大，国际交流明显增多。除德国外，又先后与日本、韩国、泰国、美国、奥地利等国的大学开展交流，其中与韩国大学间的友好交流开展得如火如荼。除交流人数增加，交流的领域也在拓宽。起初，考虑到中国学生的经济承受力，主要采取交换留学生的方式（即双方互派数名留学生，按照各自国内的收费标准交纳学费学习一年，然后回国继续完成学业）。现在，又发展了多种合作办学及交流的模式。除了学生间的交流外，老师和学校管理层间的交流互访也日益增多。

因为熟悉韩国方面的情况，我不仅协助合肥学院开展对韩交流，也经常协助安徽省内其他高校与韩国大学之间进行友好交流，到目前为止，省内好几座城市的高校都与韩国的大学缔结为姊妹学校。我还积极协同合肥的教育局及其他层次的学校开展与韩国教育领域的交流——每年安排韩国与中国的高中、初中乃至小学学生的交流互访，这种一周左右的家庭寄宿式交流，让友谊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田，他们从初识时的生疏到离别时的依依不舍，乃至留下不忍分开的眼泪，那场景令人感动。树人与树木是同一个道理，要使幼苗长成参天大树，或成为盆景一样的艺术品，就必须营造良好的环境，精心培育和修剪。友好交流提供了这样的平台，孩子们可以通过亲身体验国际交流来顺应国际化、全球化的发展。

以教育交流为起点，我所生活的合肥也在同韩国开展其他领域的交流，而所有这些交流都与改革开放分不开。试想，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中国人如何走出去？外国人又如何走进来？如果没有进和出，又怎么能够交流？

改革开放让中国与世界更加融合，同时也促进了发展。10多年前我刚到合肥时，就把这里视为“第二故乡”，虽然当时合肥的有些方面还略显不足，但经过努力，合肥已呈现出现代化大都市的风貌，我为生活在这里而感到自豪，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会说自己是“合肥人”。

沐浴在改革开放春风中的中国人在感受国家综合国力增强的同时，也在享受着个人生活水平提高的甘甜。以前，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办学条件的限制，许多孩子上不了学，上不起大学。尤其在推出教育产业化的发展理念之后，可能只有城市的孩子及那些经济状况较好的农村孩子才有机会进入大学校门；但现在，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助学贷款、各种奖学金作为辅助，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也可以圆大学梦了，有的人甚至还能出国留学，其中不少人就是前往韩国留学。

因为和韩国大学方面的天然联系，我感到现在不仅仅是赴韩留学人数的增加，其他方面也在发展变化。首先，出国途径的多元化，除了高校间的交流及合作办学外，通过留学机构前往韩国留学的也在逐年递增。其次，学习理由的多样化及学习专业的多元化，随着“韩流”在中国的兴起，留学的目的已经从起初的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扩展为体验韩国文化、感受韩国生活；留学生的专业选择也从起初的国际贸易、计算机信息技术等扩展到韩国语言文学、动漫设计等文史类、艺术类专业，即从应用性角度考虑出发到结合自身的兴趣爱好选择。再次，留学人员的年轻化，过去以本科毕业生为主，现在则有越来越多的高中毕业生赴韩留学。

一个地区教育的进步是整个国家教育发展的缩影，而教育的发展又能不同程度地反映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状况，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中国的教育事业势将突飞猛进，而有了强大的教育基础作为人才培养的支撑，相信中国必将以更加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感受巨变30年

箱根的回忆

陈喜儒



箱根，古称函岭，位于神奈川县西南，离东京很近。

说来也巧，我多次到箱根，都住在小涌园饭店。这是一座日式建筑，迤逦在山谷中。店主热情好客，我们每次去，大门口都立着热烈欢迎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标语牌，年轻的服务员捧着鲜花，挥舞着中国国旗，列队夹道欢迎。走进大门，领班就会把房间钥匙交给你，并送你到房间。钥匙很别致，是一根长约尺许的竹棍，系着半尺长的铜链，下面吊着一把钥匙。走进房间，拉开木格纸窗，满目青山，层峦叠翠，间或有几树樱花或杜鹃，散落在新绿丛中，像迷茫的桃色的云，妩媚动人。

洗个温泉澡，喝杯茶，看一会儿山景，夜幕就降临了。随着轻轻的敲门声，一个日本姑娘走进来，帮你换上宽大舒适的和服。穿上木屐，把长长的竹棍钥匙插在腰带上，走起路来，叮当作响，仿佛是古代武士佩剑而行。走进宴会厅，宾主全部和服，坐在一起，合影留念，之后围坐在餐桌前。晚餐是日本火锅，把嫩牛肉、大葱、豆腐、蘑菇、蔬菜等煮在一起，蘸着生鸡蛋汁吃，味道鲜美。席间没有宾主致词应答，而是兴之所至，海阔天空，谈笑风生。

记得1984年春天，随巴金先生到日本参加国际笔会第四十七届大会，曾到箱根小住。巴老喜欢箱根的秀丽幽静，对我说他有一位叔父，早年在日本学法律，很喜欢箱根，笔名就叫箱根室主人。在巴老换上和服准备去参加晚宴时，饭店厨师来说，经理吩咐明早把早餐送到房间，但早餐有中、西、日三种，不知巴老喜欢哪种？巴老没回答，转头问我们：“你们想吃什么？”我说：“日本餐，简单，清淡。”其实，我只是脱口而出，想都没想。巴老说：“想吃日本餐的举手。”没想到大家都举起了手。最后巴老也举起手说：“好，好，就吃日本餐。我这个团长讲民主，服从大家。”以后每天早晨，服务员都把日本餐送到巴老房间的客厅里。我们都知道巴老早晨喜欢吃西餐，就和巴老开玩笑说：“您还是不讲民主好，一民主把西餐搞没了，只能和我们一起吃日本饭。”巴老只是嘿嘿地笑……

有一次，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井上靖先生和夫人从东京赶来，与大家喝酒聊天。先生健谈，有海量，虽已年过古稀，但思维敏捷，创作精力旺盛，当时正在构思历史小说《孔子》。大家问他养身之道，他说每天做两次自编的体操，动作很简单。说着，老人走过来，大劈叉，平坐在地毯上，上身前倾，挨地，整个身体呈T形。这个动作不要说老人，就连没练过功的年轻人也做不了，但井上先生呼吸平稳，脸不变色，赢得一片喝彩。

聊到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工作，我们赞不绝口，说他们个个敬业，精明强干，既是多面手，又细致热心，一丝不苟。佐藤纯子急忙用中国话说：“不，不，还差得很远。”接着又用日语说，“我们的工作方法，是从中国学来的。前会长中岛健藏先生是我们的榜样，他言传身教，耳提面命，培养了我们的作风。”

提起故去的中岛健藏先生，大家充满了怀念之情。有人说他游颐和园时，把仅剩的一颗牙齿拔下来扔到昆明湖里，说我身体的一部分已经留在中国了。有人说他兴趣广泛，爱摄影，爱藏书，爱集邮，爱交朋友，但最爱的是中国。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局长白土吾夫说：“我在大学里学的是电气和法律，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成立时，中岛先生叫我到事务局工作。但我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专业，说我对中国一无所知，又不懂中文，实在太困难了。中岛先生说，我是学法国文学的，也不懂中文，现在不是干了吗？问题在于你是否爱中国。如果你真心爱，那就应该干。我当时大学刚毕业，很年轻，就答应了。

“1960年，我随以野间宏先生为团长的日本文学家代表团到中国访问，毛主席接见了我们。一开始，毛主席就问：你们这里面谁最年轻，最没有名气？我当时坐在后面，举手说：我。毛主席笑了，风趣地说：我年轻时，没有名气，但工作做了不少。现在有点名气了，工作就不像以前那样做得多了。大量的工作是那些没有名气，默默无闻的人干的。但我们工作不是为了出名，而是为人民服务。我本来很紧张，毛主席的这番话，使我的精神放松了，同时也暗下决心，要默默无闻地为日中文化交流干一辈子。”

横川健先生，儒雅厚重，热情细致，不仅中文好，且对中国的文化历史有很深的理解和感情。他的父母横川次郎先生和辰子女士从1946年开始，一直与中国人民患难与共，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建设，为日中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直至在中国病逝。他们的两个儿子横川健和横川伸，生在中国，长在中国，从四川大学毕业后，遵循父母的教导，回国工作。如今横川健供职于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为常任理事，横川伸在东洋大学当教授，教授中文。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成立于1956年，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中，不管日本、中国发生什么变化，它都坚如磐石，稳如泰山，始终致力于民间的文化交流，以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为己任……

每次到箱根，都谈到很晚。在这个幽静美丽的地方，大家敞开胸怀，促膝畅谈，彼此又多了几分了解，几分友情。尤其是那些肝胆相照的日本朋友，为高尚理想而奋斗的精神，使我感动敬重。

题图：箱根芦湖风光。　孙东民摄

触摸毕加索的陶艺世界

彭　敏



提到毕加索，人们自然会想起这位艺术大师的绘画与雕塑作品，然而，不久前在北京塞万提斯学院举办的“材质的诗歌·毕加索陶瓷艺术展”上，大师的陶瓷艺术令参观者耳目一新。

1946年夏天，65岁的毕加索与恋人一起到法国海滨小镇瓦洛里斯度假。在一个手工制陶工作室中，他发现了暗藏在粘土、水和火中的陶艺的魅力，于是要求工作室负责人为他辟出一个空间，开始陶艺创作。作为回报，他允许工作室出售他的陶艺作品的复制品。直到1973年去世，毕加索共有2000多件陶艺真品被保留了下来。

毕加索在陶瓷艺术创作中，充分展示了他的艺术天才。普普通通的瓷盘、陶罐经他之手，便附着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火一样的激情，手工艺品也升级为艺术品。这次展出的28件毕加索陶艺作品，散发着大师粗犷刚劲、极富变化又充满童稚的艺术气质，携带着大自然的泥土芬芳，得到国际奥委会名誉主席萨马兰奇等人的高度赞赏。

最初，毕加索只是在现成的盘子或陶罐上作画。在富有地中海特色的大盘子上，脸谱、斗牛、自然风光、动物等主题频频出现。他的立体主义画风得到完美体现，把人的五官重新安排，同时呈现脸的正面及多个侧面。我曾看过几十幅他描绘斗牛场景的黑白画稿，重神似不重形似，笔法雄劲浑厚，力透纸背。毕加索曾说：“如果我生为中国人，可能不是画家，而会成为书法家，像作画一样写字。”不同国度、不同领域的艺术之间竟有着如此不可思议的相通之处。

后来，毕加索从在陶瓷平面上作画转向在立体实物上作画，并尝试自己制作陶瓷。他在罐子的瓶颈、把手甚至罐身上作一些改动，整体展示艺术形象。《罐中罐》只作了简单的改动，以便在瓶罐身上绘有一个同比例的小罐子。大罐子中盛满了牛奶，不小心溢了出来，一些还流到了小罐子里。《女人脸》则明显地用罐身的凹凸表现女人脸部线条，有宽阔的额头、收紧的面颊和丰满的下颚。背面的把手是她高高拢起的辫子，还绘有一个美丽的蝴蝶结。

展厅门口最显眼处的作品《猫头鹰》，是毕加索把绘画、雕塑和陶艺融为一体的全新陶艺制作，整个陶罐看上去就像一尊猫头鹰雕像：尖嘴、利眼、圆臀、凸肚和后摆的羽翼。此时的毕加索已经精通烧陶技术，可以随意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用半圆凿、小尖刀、刻刀、滚轮、铁丝等工具做出任何想要的泥胚形状，同时改变釉的色彩，以达到理想中的艺术效果。

强烈的好奇心使毕加索一生都在探索新的艺术风格和创作领域。正像策展人多洛莉丝女士所指出的那样：“毕加索在陶瓷制作方面并非专业，但他把精湛的艺术创作技巧运用到了对陶瓷的塑造和美化中，就像在其他方面一样，毕加索的热情又一次决定了他的风格，带动了他的艺术创作，从而创作出大量成功的、有趣的作品。”

上图：毕加索的脸谱艺术瓷盘。　彭　敏摄

奥巴马走出夏威夷

王　恬

夏威夷，一处风景如画的度假胜地，突然间成了政治新闻的热点，因为47年前诞生在这里的奥巴马或将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

应美国东西方中心的邀请，我作为中国记者参加观摩美国总统选举的亚太记者团，首站便是夏威夷。从飞机上俯瞰，由8个火山岛组成的夏威夷群岛弧形蜿蜒，在大海汪洋中突兀出一片陆地。

最早居住于此的夏威夷族裔拥有自己的文明，之后来自世界各地的探险者、商人、捕鲸业者、制糖业者登陆岛上，夏威夷渐渐成为多种族混居、多文化交汇的地方。风光旖旎的夏威夷当然并不真正是“人间天堂”，在它的历史与现实中，不乏对抗与冲突，在这里成长的人们也不乏迷惘与矛盾。

1961年8月4日，奥巴马出生在夏威夷檀香山。他的父亲是夏威夷大学的第一个非洲学生、肯尼亚人巴拉克·侯赛因·奥巴马，他的母亲是出生在美国堪萨斯、后随父母迁居夏威夷的安·邓纳姆，他们结识在1960年夏威夷大学的一堂俄语课上。当18岁的安遇见25岁的巴拉克，生性自由的她深深地为魅力四射的巴拉克所吸引，次年两人便成婚，奥巴马随即出生。事实上，巴拉克在肯尼亚还有着一段婚姻和一个儿子。1962年，巴拉克自夏威夷大学毕业后，前往哈佛大学攻读研究生课程，安带着儿子随后跟去，但很快又回到夏威夷，两人婚姻破裂。巴拉克自哈佛毕业后回到肯尼亚，虽壮志在胸但郁郁而终。安则又嫁给了一名国际学生——来自印尼的罗罗·索托罗，并带着奥巴马跟随罗罗去了印尼，在那里又生下女儿玛雅。

奥巴马10岁时，安作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将他送回夏威夷，让他接受更好的教育。安的父母为此从一所大房子迁出，搬到有名的私立学校畔拿荷旁的一座公寓楼，方便奥巴马就学。奥巴马的外祖父是一位不算成功的生意人，外祖母却是一位成功的职业女性，担任夏威夷银行的副总裁。

在畔拿荷学校的8年，奥巴马并不算最优秀的学生，也未显现出领导才能，他常去玩人体冲浪，理想是成为篮球运动员。在学校里，他是极少数的黑人学生之一，事实上，整个夏威夷的黑人都很少，岛上大多是白人和亚裔人。奥巴马自述，在高中年代他认定了自己的身份是黑人，甚至不是“hapa”（夏威夷语，意即混血儿）。即使在夏威夷这样一个多种族交融的海岛，奥巴马也发现自己是一个“异类”，他不得不离开夏威夷去解决“身份认同的困惑”，最终选择了黑人聚居的芝加哥。

奥巴马走出了夏威夷，但夏威夷对他到底意味着什么？首先，这里是他的家乡，永远在他的心里占据特殊的地位。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他的母亲和外祖母在这里塑造了他，一个充满了理想主义和爱心，一个教会他面对现实和坚韧。这里是他发现自己的地方，他发现自己的与众不同，并试图在美国社会寻找答案。这里也是他世界观形成的地方，与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们长期生活的经验使他能够理解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里还是他学会与人合作相处的地方，夏威夷的“孤岛经验”正是妥协与合作，美国本土的强硬“西进”方式在此并不适用。

正是由于奥巴马成长经历的特殊，支持他的选民对奥巴马有所期待，希望他能够帮助美国更好地认识自身，也更好地认识世界。夏威夷一如既往地吸引着各国游客，但旅游项目已增加了一项——“奥巴马景点”。

旅人心语

带上画笔来中国

裴广江



小时候萨阿德听母亲说，有一处长满鲜花的地方，那里的父母们头上都有光晕，他们告诉孩子们如何飞翔，怎样热爱生活。如今，31岁的埃及画家萨阿德来到中国深圳，他说这里就是母亲故事中提到的地方。他拍下街上的行人，把照片剪好后贴到画板上，在人们头顶画上光晕，给他们添上天使的翅膀，再用鲜花点缀，就形成了新的画作。

同萨阿德一同来到中国的还有4位非洲画家，他们是受文化部之邀来华创作的第一批非洲画家。在深圳市区银湖畔青山绿水之间的深圳画院，5位非洲画家每人都有一间画室。他们将在这里用两个月的时间，感受中国的山水和文化，并用画笔记录下中非文化碰撞出的艺术火花。

爱德华是肯尼亚肯雅塔大学美术系讲师，他的一幅山水画右上角有一个大大的黑人头像，眺望着远处的风景。“那就是我！”爱德华说，深圳画院附近的风光让他想起了家乡山谷的风景，于是他根据朋友给自己拍的照片创作了这幅画。他给一幅反映深圳发展变化的抽象画取名为《阴·阳》。他说画中的绿色和蓝色代表老年人，红色代表朝气蓬勃的青年人，而金色则代表着财富，整幅画寓意着老年人和青年人一起建设新的城市。

身为老师的爱德华对中国画颇有研究。“中国山水画只用简单的几笔就能表现很多事物，比如中国画家画一朵花，用毛笔点一两下，整个感觉就出来了。虽然主要用黑色，但只要使用一点粉色或红色，这一点就能一下跃入你的眼帘。”他说，非洲传统画与中国画很像，都简洁且要点突出，但现代画使用色彩过多。“我回去一定要教学生们中国画，让他们学习使用黑色作画。”

南非画家安吉拉的画室正对着银湖。与爱德华的画室一样，她的桌子上凌乱地躺着画笔和其他绘画工具，不同的是，她的桌上还有一沓沓照片，而这些照片就是她创作的源泉。“在参观何香凝美术馆时，我发现了中国画家王广义的雕塑作品，木雕人物的姿势有很浪漫的非洲色彩，我决定以此为基础。”在她创作的作品中，有一幅反映深圳发展的画作：一名年轻女性右手高擎着一只鸟巢，鸟巢中有6枚鸟蛋，象征着深圳是投资的孵化器。安吉拉说，由于不会说中文，她在中国的体验多是无声的，但正是这些无声的雕塑吸引了她，激发出创作的灵感。

在安吉拉的画室里，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那幅邓小平画像了。画中邓小平目视前方，正阔步前行，大衣下摆被微风吹起，这幅画取材于深圳市莲花山公园中的邓小平塑像。安吉拉说，她准备为包括自己在内的5位非洲画家每人画一幅画，与关于中国人的画放在一起展出，以表现中非友谊。

科特迪瓦国家美术学院美术系主任马蒂尔德是5名画家中唯一多次来过中国的，她曾在北京语言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学习。马蒂尔德学习过中国书法和国画，她认为书法是中国特有的文化。在她心中，中国人和科特迪瓦人就像一家人一样。在汶川地震发生后，她把中国书法与树木画融为一体，创作了4幅反映汶川地震的画作，并赋诗表达她与中国人民同悲恸、共命运的心情。

来自贝宁的庞斯特意从祖国带来帆布。他说在旧帆布上作画就像在和历史对话。他把帆布铺在地上，泼墨涂彩，他的画室也是唯一没有桌子的画室。

虽然来中国一个月了，但画家们对这里的一切仍充满新鲜感。他们说，到中国创作的邀请让人无法拒绝。这里的每一顿饭都与众不同，每一道菜都别具特色，而吃饭时的圆桌则象征着中国人乐与他人分享的特点。安吉拉说，这里的创作经历让他们进入到一个崭新的艺术世界。

题图：4名非洲画家（自左至右）安吉拉、爱德华、马蒂尔德和庞斯在深圳画院前合影。　裴广江摄

国际副刊

本版责任编辑：王小光
电子信箱
gjfk@pd.people.com.cn